

责编/乐建中  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许明

## 山腰上的 汽车站

□王剑波

我给志林打去电话,问他桑洲老车站还在不在,我想回去看看。

志林大我四天,是我的表兄,也是我的初中同学。他说,早就没有了,那个地方现在造了水塔。你怎么想起要去看老车站了?

是啊!我怎么想起要去看老车站呢?自从四十多年前离开桑洲后,我走了不少地方,有着无数次的出发与抵达,但身为过客,那些气势雄伟的国际机场和恢弘壮观的高铁站,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印象,反而是家乡山腰上的汽车站,却牢牢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桑洲汽车站很小,小到只有一座平房。甬临线像一根布带绕山而来,汽车站就是布带上的一个“结”;形单影只的汽车好似在布带上缓慢爬行的甲壳虫,遇到“结”就停了下来。

而在我们这些小镇少年的眼里,汽车站却很大,在这里似乎可以望到山外的广阔世界。桑洲人将“看”说成“相”,去汽车站相汽车,既是小镇少年的一项娱乐活动,也是一次假想中的“去远方”。

往往汽车还未在公路拐弯处出现,老林就从平房里出来了。老林是站长。他好像是黄岩人,全家都住在这座平房里。平房的门厅是候车的地方,再往里是售票室,右侧就是老林一家的居室。老林的儿子小林和我同一年级,是乒乓球高手,他左手挥拍,在同学中战无不胜。我们去车站相汽车,实际上就是去小林的家里玩。

老林从屋里出来的时候,脖颈上挂着一个哨子,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圆珠笔,手里拿着一红一绿两面小旗,腋下夹着一块小薄板,板上用铁皮夹子夹着一张纸。

汽车是慢慢开过来的。即使是从宁波方向开来的车子,到站前虽然正处于下坡路段,但司机应该是早就将速度放慢,作好了停车的准备,当老林举起红旗吹响哨子,汽车也正好停了下来。

这时,甬临线又像一棵倒卧的大树,两旁的青山是它伸出的枝叶,山坡上一道道弯曲的地坎就是一根根叶脉;而车

站恰似筑在大树上的蜂巢,上车下车的旅客好似一只只蜜蜂,停留片刻,便忙碌碌地去往各自的地方。

老林和司机核对着上下车的人数,用圆珠笔在纸上写写划划。待车门关上后,他便举起绿色的小旗,吹响发车的哨音,汽车尾部喷出一股黑烟,喘息着继续向山上或山下驶去。我们这些相汽车的人,心思似乎也随着走远,直到车身边隐没在山的那边,才心有不甘地回家。

像这样漫无目的地相汽车,次数并不是很多,我去车站大多是有任务的,或者是接人、送人,或者是自己上车出行,而每一次去车站的心情也会不同。

最兴奋的当然是去车站接父亲。父亲在上海教书,每年寒暑假回老家,事先会写信告诉到家的日期。父亲乘轮船到宁波,再转乘宁波开往三门的汽车,这班车经过桑洲的时间大约在下午三点左右。这一天,我往往吃过中饭就出了家门,沿着长长的老街向前走去,也许因为心情愉快,街两旁依次出现的供销社、棉布店、合作商店、邮电局和理发店,看上去似乎比平日热闹得多。在快到水电站和食品站的地方右转,穿过一条墙弄,便看到了风水坝头的古树群和树群旁交易猪仔的“小猪场”。这时我的心开始提了起来,因为前面就是上山陈村,有一次,就因为朝村里一处开着闾门的道地看了一眼,结果被冲出的恶犬扑倒在地,小腿上留下了被咬的齿痕。从此,每次穿过上山陈的时候都会提心吊胆、目不斜视,出了村才把心放下,然后轻松地唱起歌,沿着蜿蜒向上的小路,走向山腰上的汽车站。

老林和小林都知道我是来接父亲。我一边和他们说着话,一边抬眼瞄着候车室里的自鸣钟。班车并不一定准时到达,我就一遍遍问:林站长,汽车快来了吗?老林总是回答:急什么?我还没接到电话呢。那时候,汽车从前方车站开出后,会用手摇电话机通知下一站。

终于,汽车出现在山路的转弯处,但车头一闪,还没来得及辨出车的颜色,车身又被山体遮住了,等再看到的时候,车子已经从笔直的下坡路上开了过来。

车子还没停稳,我就透过车窗寻找父亲的身影,而这时父亲其实早已站在车门的旁边等着下车。

见到父亲当然高兴,但我更盼望的是父亲带回的书籍,往往等不及回到家中,在路上

就开始翻看,或者边走边读着网线袋里露出的用于包装物品的报纸。

到了父亲要回上海的时候,最担心的是能否买到车票。在桑洲车站停靠的班车不多,留给这里的余票更少,而周边乡村出远门的都是从这里启程,这就造成车票供不应求。加上桑洲是工匠之乡,特别是石匠手艺远近闻名,有一大批人在全国各地做生活,打山洞、筑塘坝、造桥铺路。过完年,石匠们就会在行囊里装着路上充饥的“桑洲麦饼”,三五成群结伴出门。他们的去向都是往北,而这个方向的班车,也就三门至宁波、临海至宁波屈指可数的几趟,因此每年正月十四以后的一段时间,汽车票最为紧俏。

有时候父亲会事先和老林打招呼,希望能留一张票,但票不拿到手,心里总是不踏实,所以每到父亲返程的日子,早晨四五点钟我就要起来去车站买票。夏天还好,太阳还没上山,晨风凉爽宜人,而冬天的这个时间天还黑着呢。因为到得早,老林一家还没起床,车站的门还关着,买票的人就站着聊天,相互打听各自前往的目的地。我默默地数着等票的人数,预测着能不能买到票。这时的心情是矛盾的,既盼着买到车票让父亲顺利返校,又想着如果买不到票父亲就可以在家中多住几天。但即使多留几天又怎样呢?父亲总是要回上海的。

去宁波的车是从南边开来的。站在车站朝南看,公路被凸出的山嘴遮挡,出现在视线里的只有短短的一截,往往是等车的人还没注意到,车子就已经转过山嘴停在面前了。这使告别时刻来得猝不及防,临别的话还没有说够,出门的人就得上车了。往北走的是上坡路,汽车开得很慢很吃力,似乎是有意延长时间让远行者与亲人挥别,父亲也总是要等到汽车爬完直坡转弯了,才从窗口收回久久摇动着的手。

我也曾多次在这个车站上车。小学时我跟着母亲在三十多里外一个叫大郑的村庄上学,假期有时会回桑洲;

开学时如果是我一个人乘车回学校,送我上车的便是外公了。有一次,我上车后坐在靠窗的位置,外公站在车下,反复提醒我在梁皇下车后应该走哪条路。就在车门关上的时候,他似乎想到了什么,摸索着从贴胸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崭新的钞票——一张新版的“一角”纸币,从开着的车窗递给我。我嘴上说着不要不要,手却早已伸出去将钱接了过来,惹得车上的人一阵大笑:毕竟是孩子啊!车子开动了,两旁的山和树都在往后退,外公的身影也越退越远,越来越小,我将带着外公体温的新钞票放进衣袋,用手紧紧地按着……

1976年春天,我再一次在这个山腰上的车站启程。这一次是去农场插队,是人生道路上一次真正的远行——离别父母,走向社会。我当然还会回桑洲,但从此以后,当我和别人说起这个山中小镇,在人们的心目中,这里已经是我的老家或者说是我的故乡了。汽车启动的时候,我挥手与亲友告别,心里也默默地在与家乡的山水告别。

给志林打电话的第二天,我便一个人开车从宁波回到桑洲,从小镇南边的中央溪上行,来到汽车站所在的半山腰。志林说得没错,在原先车站的位置上,一座水塔高高耸立,全然不见旧时景象。没有哨声响起,没有红绿小旗的挥动,也不再汽车到站时的喧闹嘈杂,那些在这里翘首等待亲人归来的人,那些在这里告别亲友登车远行的人,都已在时光中消散了身影。

我在不见车影和人迹的公路上伫立,山下是新房子鳞次栉比的桑洲镇和穿镇而过的古老清溪,改道后的甬临线宽阔平坦,在青山下逶迤着向远方延伸。太阳当空,时间已是正午,我靠在车上吃着刚才在镇街上买的“桑洲麦饼”,品尝着家乡的味道,也咀嚼着岁月的滋味……

